

【中国思想史】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浅论

陈国庆

(西北大学 社会科学系,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从传统文化塑造的国格与人格、中庸的思维方法论、重然诺守诚信及主和的人际关系论、积极入世和求实精神几个方面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当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越来越显现出来,其中的某些学说可以成为以德治国、医治现代文明所引发疾病的“药方”。

关键词:传统文化;国格与人格;中庸;求实;主和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1)02-0089-06

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由多种因素依辩证统一规律构造而成。它不仅需要自然科学与技术工艺直接推动物质生产的发展,而且需要社会科学与文化艺术把握自身的发展规律,不断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加快精神文明建设进程。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作用,如果用中国古人简明扼要的表述,就是“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人类精神文明的构成,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它可以帮助人们深刻了解中国社会悠久的历史,清楚认识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道德修养水平,在若干方面发挥十分突出的作用。探讨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即怎样评估传统文化的价值。长期以来,无论学术界还是普通民众基本形成共识,那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既不能完全抛弃,也不能全盘继承,因为它包含精华和糟粕等各种因素,有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部分(精华),也有已经过时或腐化的部分(糟粕),两者至今仍然发挥程度不等的作用,并没有完全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究竟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却很少有人做深入辨析和论证。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如何评估传统文化价值的问题。

通过学习和研究,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不应当停留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个一般性口号的层次上,这样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做踏踏实实的具体研究工作,细心分辨、剖析传统文化中各种文化体系、各项思想成果,甚至各个具体概念和范畴,并予以价值评估。只有这样,才能从中摄取真正适合现代社会需要的思想文化资料,并对其进行“活化”性改造,即融会新知、陶旧铸新,并能够落到当代社会生活中实际应用的层面上。限于篇幅,本文仅从若干方面对其主要内容进行价值评估。

收稿日期:1999-05-20

作者简介:陈国庆(1958-),男,河北沧州人,西北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思想文化研究。

一、国格与人格论价值

传统文化以人为核心,意蕴极其丰富。它探讨人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基本问题,以社会伦理观和道德修养论为主要内容,维护国家的安定、民族和解、社会的稳定与持续发展;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及个人的道德修养,强调执着、尚礼、求实、人世间精神。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至今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有其不容忽视的重要思想价值和社会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理想人格与国格孜孜追求的执着精神。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生息繁衍中,形成自己独特的国家尊严、荣誉和品格观念,即中国的国格,它是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真正源泉。与此同时,传统文化中还形成独特的人格观,即一个人做人的资格和为人的品格的养成,它包含有修身养性的品格锻造,强调个人对国家命运的关心。传统文化中的国格与人格观念,具有热爱祖国、培养人们的高尚情操,为保家卫国、服务社会而贡献力量的道德功能。例如,儒家一直追求的内圣外王,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1](《礼记·大学》)的“八条目”,全面总结了个人修养方法和参与社会、治理国家的关系,它既是政治伦理学说,又是修养理想人格的有效途径,这也表明传统国格与人格的一致性。如孟子所说:“天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2](《孟子·离娄上》)

在具体的修养过程中,人们首先提出并确定人生的奋斗目标。在古代学人观念中,人的理想就是“志”。一个人应当有终身为之奋斗的大目标,即使生活再动荡、再艰苦,也不可轻易改变。越是在困难条件下,越是要坚持自己的操守,经受考验,而不为一时之名利放弃多年夙求的操守和志向。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用生命维护国格和自己人格的尊严。这种价值观,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培育了无数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而抛头洒血的仁人志士,著名人物文天祥所写下的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极具典型意义。

人格修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大致包括三个阶段,即人格观孕育与形成、人格观确立与调整、人格观完善与守成。在人格观修养的道德实践过程中,应当由浅入深,不能浅尝辄止,前功尽弃。人们应当不断超越自己、完善自己,使自己秉性中的善端凝结成真、善、美的果实,从而达到完善人格之极致。中国古代学人认为,人格修养的完善,关键是要控制自己的感情。这不仅是指人在年少时,理性对感情的失控,也指人在年长时,感性对理性的侵蚀。人的一生就是要不断节制自己、调整自己、塑造自己、培养自己的适应性心理,合乎社会的规范与要求,从而顺利实现理想人格的塑造。

二、思维与方法论价值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庞大体系中,无论儒家、道家还是佛家,都尽可能地避免极端与偏执性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注重“中和”的思维与方法论特点。在此,以儒家学者提出的“中庸”学说最具代表性。“中庸”不是不偏不倚、毫无原则地对任何矛盾或冲突加以调和,而是不偏于对立双方的任何一方,使双方保持均衡状态。从处世智慧上讲,“中庸”是生活在群体中的人们所可能寻求到的人性最佳状态和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从伦理学上讲,人的言论、行为不能偏于极端。因此,“中庸”被看成道德上的“黄金律”。掌握“中庸”的方法论,有益于人格的修养、人际关系的协调,有利于人们思维方式的全面发展,也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中庸”学说是一种思维方式,它主张对任何事物都必须掌握原则,把握处于

对立状态下的两端,协调矛盾着的对立面,强调“用中”,即彼此之间可以互相沟通的那一部分,兼顾双边的利益,避免偏于一个极端的倾向。“中庸”力戒片面和僵化,富有辩证思维色彩。

把中庸的方法论用于现代社会生活,可以提高人们的工作能力和办事效率,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在具体实践中,反对做事过分、超过应有的度。同时也反对做事保守、消极和惰性,反对主观臆断和绝对化,反对拘泥与偏执和惟我独尊、惟我独是,主张理论与社会客观现实的有机结合。“中庸”不以僵死的、停滞不前的眼光看待事物,而是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追求量变或质变下的“中”。在与人交往中,如能恰当运用“中庸”的原理,就会表现得高雅大方、稳健得体、增强人对自己的信任感,也会更加有利于施展自己的才华,获得交友与事业的成功。与此相反,如果表现得傲慢自大、盛气凌人,或过于谦卑、惟命是从,就会引起他人的厌恶,导致人际关系破裂,或被人颐指气使,失去人格尊严。

循“中庸”思维,中国古代学人特别强调和谐与协调的重要性。概而言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和谐,即人与自然界天地万物的和谐与协调;人与他人、社会的和谐与协调;个人自身内部的和谐与协调。从对于这三个方面的概括和论述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学人是极富智慧的。他们把世界万物看作一个有机整体,人应当因地制宜,与万物相依共存,要主观适应客观。但这决不是不思进取,听凭自然界的选擇,而是使人在自然界的生存环境中,找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佳状态。“人定胜天”就是有说服力的概括。随着工业化程度的加深,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人类的生存条件急剧恶化。面对这一全人类的共同课题,如能认真体悟古人“中庸”的思维模式,将会给人类许多有益的启示。

在后工业社会,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尤其突出。古代学人认为,要使社会群体不急不乱,必要的人伦礼仪是不可缺少的。所有人都要注重对自我的节制,对他人的宽容,提倡诚恳坦率,反对勾心斗角,主张在平等的基础上,和平共处,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论语·雍也》)。总之,人际关系的和谐,有利于社会的安定,也有利于个人的身心健康。

个人自身内在的自我和谐是中国古代学人特别予以考虑的重要问题。他们承认人的生理欲望及情感要求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更强调人的理性自觉和对高尚道德境界的追求;主张对不合理的欲望给予压抑和节制,不去追求那些不可追求和追求不到的名位与财富,保持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和谐统一,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如此,便可实现人的心理平衡。

在以上三个方面和谐的基础上,古代学人特别注重“和而不同”的思维方式,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2](《论语·子路》)。有修养的正派人以“和”为准则,决不盲目附和,随波逐流,而是敢于公开自己的见解。那些没有修养的乡愿,则毫无是非观念,处处盲目附和,却没有自己的独立主张。以“和而不同”的思维方式为人处世,就能做到既与人和睦相处,又不放弃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见解。这种思维方式的优长在于:允许不同个性、不同意见的共同存在,而不是取消个性,取消相互间的差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观念,就是“和而不同”在学术上的具体表现。各种学术观点之间既相互诘难、相互批评,又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各学术流派,应当发扬本学派的优长,摒弃门户之见,不拘于旧说,以灵活态度取长补短。只有如此,才能形成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形成学术上的繁荣局面,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

由“和而不同”导引出的兼综百家、独立思考与求实创新的辩证思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

极有价值的珍品。对于外来文化,中国古代学人没有采取拒绝、排斥的态度,而是以“和而不同”的原则,使外来文化民族化,并成为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不仅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容,而且促成学术上的繁荣局面,使传统文化获得新发展。今天,我们更应当以宽阔的胸怀,吸收和借鉴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为我所用。

中国古代学人的“中庸”、“主和”及“和而不同”思想方法论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它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和方法渗透到社会生活各方面,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如在政治上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在企业管理和经营方面,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经济的腾飞;在思想文化和学术领域,有利于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三、人际关系论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人本主义,以追求真、善、美为社会理想和个人道德修养的目标,以“礼尚往来”为基本原则,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主要内容,协调社会群体以及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观念和准则,基本适合当代社会生活,可作为不同政治、经济地位的人们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则。

在传统文化中,古代学人特别重视“礼”,以此作为维系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礼”本来是古老的祭神仪式,后经儒家的改革,逐步变成以“隆礼敬德”为中心的系统完备的礼仪制度。它既是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的法律依据,又是分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的道德规范。“礼”具有不可侵犯的神圣性。任何人违“礼”,轻者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重者遭到刑法惩处。在古代社会,往往以国家的强制手段作为实施“礼”的保证。这表明,“礼”具有类似于法典的权威性。于是,“礼”便包含了道德规范和法律制裁的双重性质与功能。它对于人的行为和社会肌体的协调运转,都具有极强的约束力。具体地说,古代学人认为,一个人应当把外表的礼节、仪式同内心的道德观念结合起来,即“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论语·雍也》)。“文”与“质”恰当结合,才符合“礼”的要求,具备仁德又遵守礼仪,才是真正的君子。

长期以来,人们饱尝了因缺乏文明教育而招致的严重后果,由此获得的教训十分深刻。实际上,古代学人早就发明了许多用以维护人际关系和谐与协调的行为准则和礼貌用语,为今天留下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一个没有礼仪的社会,易于引发动荡,且很难获得经济的平稳发展。即使已经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社会,如果缺乏应有的礼仪,人们也很难生活在安乐、祥和、文明的环境里。因此,生活在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应当时刻注意使自己的视听言行合乎礼仪道德;在人际交往中,要与人为善,使用礼貌用语;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别人为自己提供了帮助,付出了时间、精力或劳动,除适当付酬外,还要真诚地表示感谢。只有以“礼”的原则约束社会,约束每个社会成员,人们就会沐浴在温暖的情意之中。所以,古代学人关于“礼”的论述,有益于我们今天营造人与人之间互相尊敬、与人为善的良好社会风气。

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必然涉及利人与利己的问题。这两者既是对立的,也是一致的。这里的一致是指,在某些情况下,利人的同时也是在利己,利己的同时也是在利人。例如,抵抗外来侵略,维护社会安定,保持生态平衡,治理环境污染,等等。但利己与利人也经常处于对立状态。为解决这个人问题,古代学人提出“忠恕之道”做为处理人己关系的准则,“居处恭,执事敬,与人恕”[3](《论语·子路》),尽自己的一切能力,消除别人有可能对自己产生的怨

恨,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人。人生活在社会群体中,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群体利益密切联系,具有不可分割性。每个社会成员虽有追求个人利益的欲望和权力,但不可极端利己,不能损害他人及群体的利益。否则,个人利益也无法实现。中国古代大多数学人在处理利人与利己这个矛盾时,主张应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一部分,维护他人利益;牺牲局部利益,维护整体利益。这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品质。

中国古代在处理人际关系问题上,还有一些十分可取的思想观点。比如,重然诺、守诚信的思想就很有见地。在先秦时期,“信”开始作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规范,用以约束人们的言行,对此,孔子做出很大努力。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2](《论语·为政》)这是说,作为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不能做到诚实无欺,那就不晓得能做出什么事情。从那时起,正人君子都把“信”当做为人处事的行为准则。孟子对此又有所发挥,认为“信”是每个人必不可少的品德,并把“信”纳入“五伦”的规范中,使“信”在人伦关系中的价值和作用得到肯定,特别强调“朋友有信”,不讲“信”不能交朋友。西汉学者董仲舒正式把“信”归入道德规范中,以“仁、义、礼、智、信”五常并举,认为“五常”是人类永恒的道德准则。这就确立了“信”的重要地位。在古人看来,“信”是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信”是从政的重要素质;“信”是交友的必备信条;信是自我修养的主要内容。此后,“信”成为建立在平等关系上的人与人交往的基本原则——重然诺、守诚信,并为大多数民众所遵循的传统美德。换言之,“信”是做人的起码要求,是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民族、任何阶层所不可缺少的。只要有人类存在,“信”就不会消失。它向人们指出一条道德教育、道德修养的途径。可以这样说,“信”是修养理想人格的起点。

四、入世与求实论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无论道德修养、人生态度,还是知识积累、思维方式,都是为了经国济民、学以致用。所谓经世致用,是对中国古代学者(这以儒家学者为主,道家和佛家此处不论)积极入世精神最恰切的概括。从儒家学说的核心理念“内圣外王”可以看出,其目的是从“内圣”(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达到“外王”(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在这种重视国计民生、积极入世思想的培育下,传统知识分子大多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例如,脍炙人口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深层意识之中,哺育了无数中华优秀儿女。在这种意识支配下,他们始终心怀天下,情系苍生,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而献身。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更加坚强,与这种积极入世精神密不可分。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带有浓厚的与自然抗争的历史色彩;培育传统文化的土壤,无疑是农业型的自给自足式自然经济。因而,它不适宜今天社会的需要,对于此说,我们有不同看法。在古代社会,传统文化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使社会生产不断发展,传统农业文明达到无比辉煌的高峰,与此同时,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也日趋程式化,发达的农业文明又进一步促进传统文化的发展和成熟,并成为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为文化、教育、学术事业的繁荣兴盛,提供了必要条件。古代中国能够始终处于世界发展大潮的前列,并为全人类创造了宝贵的文化财富,不能不归因于古代学人们非宗教主义的积极入世精神。今天,我们用现代文明的眼光看待它,仍然可以发现其中闪光的亮点。

自先秦起,古代学人们极力倡导“求实”精神,这以他们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为基础。儒家创始人孔子说:“知之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2](《论语·为政》)在这种求实精神

影响下,古代学者无论进而庙堂从政为官,也无论退而山林著书授徒,他们始终不渝地恪守“求实”的观念。正正派派为官,老老实实做人。这种观念还表现在重视社会实践,并从实践中获得真知的实行、践履。孔子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2](《论语·公冶长》)又说:“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2](《论语·学而》)此处所讲的“躬行”,即身体力行;“行”,即社会生活中的实践活动。一个人在思想上的道德修养是必不可少的,但把道德意识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则是更有意义的事情。古代大多数思想家、大学问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把书本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这种认识和做法是科学的,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有显著效果的。这也表明,古代许多学人具有朴素的“实践”观点,儒家学说中的“学”、“思”、“行”说明社会实践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这当然与他们积极的人世思想紧密联系。不可否认,求实思想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清流、精华,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近代以降,中国遭遇西方列强的侵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使中国传统文化面临严峻考验。这就使一些学者得出传统文化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惰性力量的结论,因而认为传统文化一无是处,应当彻底加以清除。这种看法在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文化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获得迅猛发展,有些学者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可否认,传统文化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有着广泛的影响,精明的企业家们创造性地把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思想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确实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是,过分夸大传统文化对东南亚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妥的,中国传统文化既不是发展经济的惟一“灵丹妙药”,也不是毫无价值的僵死之物。我们应当对传统文化进行分辨、取舍、继承和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其活力,利用其价值,发挥其作用,使其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1] 许嘉璐. 文白对照十三经:上卷[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2] 许嘉璐. 文白对照十三经:下卷[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 徐怀东]

A Brief Introduction on the Valu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HEN Guo-qing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Withou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ethical and cultural progress of the human race as a whole could not take its present form.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national and personal prestige, mentality and methodolog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participation and practicalness, approaches the significance and present value of such ideas as adherence to the golden mean, attention to etiquette, stress on credit, and encouragement of participation and practicalness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t highlights in the meantime the importance of the analysis, selection succession and innov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order to make progress with times.

Key words: traditional culture; personal moral quality and national dignity; The golden wean; realistic approach; harmony pursuit